

克洛德·罗阿：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精神出路^{*}

许玉婷

摘要：克洛德·罗阿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他参加抵抗运动，积极介入世界，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遭遇中国及中国文化是罗阿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本文梳理罗阿自传、诗歌中有关中国的文献，结合罗阿撰写的《中国之钥》与《论中国》，揭示罗阿接近、接受中国文化并从中找到精神出路的过程，说明罗阿自小通过阅读凡尔纳小说、中国道家典籍、中国古诗，发现自己与中国文化声气相投，中年以后政治介入的挫败促使他进一步回到中国文化，寻求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另一种幸福的方式，从而找到精神出路，解除精神危机。罗阿与中国的关系是一部个人史，但是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罗阿与中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理解这位法国著名作家，而且能够丰富我们对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认识。

关键词：罗阿 中国文化 精神出路

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1915—1997）是法国20世纪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狄德罗式的多题材作家。法国拉鲁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词典》（*Dictionnaire mondial des littératures*）有关罗阿的词条对他作了如下介绍：“他在自传三部曲《我》（*Moi je*，1969）、《我们》（*Nous*，1972）、《总结》（*Somme toute*，1976）中回忆了他的政治介入。他是一位诗人，著有《亮如白昼》（*Clair comme le jour*，1943）、《秋天之旅》（*Voyages d'automne*，1987）。

^{*}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社基金项目“论克洛德·罗阿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项目编号：2018SJA0200）阶段性成果。

他是一位小说家，发表了《黑夜是穷人的外套》(*La nuit est le manteau des pauvres*, 1948)、《远方的朋友》(*L'ami lointain*, 1987)。他还是文学艺术批评家，著有多卷本《评论集》(*Descriptions critiques*, 1949—1965)、《对绘画的热爱》(*L'amour de la peinture*, 1956)。他著有游记和日记，勾勒了他的思想历程。”^① 这个词条对罗阿的政治介入与思想历程有所突出，视之为作家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之一。罗阿的自传三部曲回顾了他介入世界的经过，描绘了他的思想历程，构成研究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罗阿宣称，遭遇中国是他及同时代人的一件大事。研究罗阿与中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理解这位法国著名作家、诗人，而且能够加深我们对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认识。本文梳理罗阿的自传、诗歌中有关中国的文献，结合罗阿撰写的《中国之钥》与《有关中国》，揭示罗阿接近、接受中国文化并从中找到精神出路的过程。

一、与中国文化声气相投

克洛德·罗阿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家乡夏朗德省雅尔纳克市是天主教重镇，那里诞生了著名的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后者颇得罗阿赏识。但是罗阿自小便对天主教产生怀疑，因为他在儿童教义书中看到上帝教导儿童要对仆人有礼貌，认为上帝“只关心有钱人家的孩子”^② 而对穷孩子漠不关心。他进一步发现，天主教教义与他观察到的现实截然不同，老师的教导与他的个人体验存在天差地别。就这样，罗阿年仅十岁便成为异端。罗阿十二岁的时候阅读了凡尔纳唯一一部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Les tribulation d'un Chinois en Chine*)，从此与中国

^① Pascal Mougin et Karen Haddad-Wotling, *Dictionnaire mondial des littératures* (Paris: Larousse, 2002), p.566.

^②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62.

结缘。中国文化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信仰缺失造成的精神空白。少年罗阿对凡尔纳的这部小说爱不释手，主人公金福和王哲人让他倍感亲切，他觉得自己同时是金福也是王哲人，一面和金福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冒险，一面又化身哲学家王先生。他尤其赞赏王哲人的智慧，后者经常说：“与其麻醉一个民族，还不如教育他们！经商固然好，哲学价更高。我们大家都讲点哲学，学点哲学吧！”^①在家庭教师王哲人的设计安排之下，富家子弟金福经历了一系列冒险，“不再是那个冷漠无情的凡夫俗子了，他现在考虑问题也比较周全了”^②，他终于懂得了生命的价值，也明白了“为别人做好事（……）正是幸福的真正秘诀”^③。王哲人则呈现了理想的中国人形象，代表了完满的中国智慧，他“聪明过人，十分乐观，他的哲学观总带着些幽默和敏感想象力。他忠诚厚道，大公无私，把友谊置于一切美德之上，在厄运面前沉稳明智，满足于在金福家过着清贫单身的生活”^④。王哲人身上所生动体现的“中国人保持平静的哲学”^⑤以及这种哲学主导下的幸福观不仅是凡尔纳赞赏的，也正是多年以后罗阿所追求的智慧。1943—1945年间，青年罗阿作为抵抗运动员、作家、记者，奋战在被占领的巴黎，面对凶残顽固的敌人，他和他的同伴们反倒获得了内心的宁静，感到幸福而自由^⑥。这种幸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为祖国和同胞服务所产生的满足感，就像他后来回忆的：“二十年来，不断有陌生人给我写信，或者是无意中和我相遇，他们告诉我说，在占领时期，我的某一首诗，或者当时发表的某本书的某一页，那时候的某个专栏，某个呼吁帮助他们。我投向风中的话语能

① 转引自 Claude Roy, *Nous*, Paris, Gallimard, 1972, p.492. 译文参考：〔法〕儒勒·凡尔纳：《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王仁才、威廉·鲍卓贤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② 〔法〕儒勒·凡尔纳：《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王仁才、威廉·鲍卓贤译，第232页。

③ 同上书，第231页。

④ 同上书，《译者序》，第6页。

⑤ 同上书，第7页。

⑥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139.

够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样的效果，因此而得到别人的答谢，这比别人赞赏我的‘才华’更令我感到一个作家的心满意足。”^①

金福的心上人娜娥是小说中另一个光彩照人的中国女性形象。她是虔诚的佛教徒，遇有难事就向观音菩萨祈祷，金福身处险境的时候，“庙里的师父经常看见她来烧香拜佛，在观音菩萨前磕头作揖，虔诚地敬上一炷香，为她的情人祈祷，愿菩萨保佑他幸福安康”^②。罗阿自十岁起便对上帝产生了怀疑，而在他阅读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以后，救苦救难、悲悯众生的观音菩萨无疑进一步撼动了上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多年以后，罗阿年近古稀，罹患癌症，常常会想起这位温柔、慈悲的菩萨。1983年1月30日他在自己的乡村别墅写下《无神论者》(L'impie)，诗人说他非常怀疑诸神的神圣性，人不过是借诸神的口跟自己对话，而上帝这个词本身是个毫无意义的陷阱；然而，他却自愿在办公室供奉观音这位大慈大悲怜悯众生的神祇的塑像^③。同年6月5日作于医院的一首题为《黑暗的教导》(Leçon de ténèbres)的诗中，诗人描写自己忙于学习各种知识，做笔记以备不时之需，忙于制定各种计划，丰富人生阅历；但是他已经预感到死亡将至，他只是希望临死之前，自己能够将手头的任务完成，将工具摆放整齐，将房间收拾干净，兑现许下的诺言……在此，诗人将上帝比作残忍的猎鹰，将时间之网撕碎，而观音和圣母玛利亚则温柔仁慈、怜悯众生^④。严格地说，罗阿敬奉观音菩萨，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对观音菩萨所拥有的胸怀与智慧的赞赏与叹服，而这种智慧与胸怀正是中华思想的重要元素。正如南怀瑾所言，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素以仁义存心的教化相融合，已成为家喻户晓、男女老幼无所不知的人生守则；以慈悲的心肠而济世利物，以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

①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p.410-411.

② [法]儒勒·凡尔纳：《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王仁才、威廉·鲍卓贤译，第138页。

③ Claude Roy, *A la lisière du temps/Le voyage d'automne* (Paris: Gallimard, 1990), p.75.

④ Ibid., p.110.

的怀抱救苦救难，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①

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给少年罗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年以后，罗阿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趴在地毯上阅读这部小说时的神奇感受。十几岁的孩子由于怀疑上帝而产生第一次精神危机，中国文化为他展示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这个孩子没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生存对他而言首先是一种体验，存在的经验先于存在的概念，经验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通过阅读《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罗阿发现，东方的教导更契合他的心灵，因为东方的教导是“非宗教的宗教，是经验性的宗教”^②。1952年当他有机会到中国旅行的时候，他坦承，“自从十二岁读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以后，二十三年来做梦都想到中国旅行”^③，他多次强调，此次中国之行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到中国寻觅儒勒·凡尔纳”^④。1969年，罗阿第一个提出将汉语教学纳入法国义务教育体系。当时法国已有多所大学开设汉语课，但是罗阿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从初中阶段开始开设汉语课，因为“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思想、艺术、‘宗教’，可以开阔法国孩子的视野，让他们发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也能造就社会和个人的幸福”^⑤，而不是让他们“舒舒服服、从从容容地呆在一个文化训练系统里，相信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所提出的社会制度、生和死的方式、信仰上帝和不信神的方式、生存之道等等，是最好、最聪明的，是历史的一切”^⑥。以上这些话可以说是罗阿的经验之谈，他少年时期得益于中国文明的，他希望法国青少年也能从中受益。如今汉语教学已经逐步纳入法国中小学教育体系，越来越多的法国中小学开设汉语课，汉语学习在法国成为一种全国性

① 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②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78.

③ Claude Roy, *Clefs po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53, 5^e édition), p.11.

④ Claude Roy, *Nous* (Paris: Gallimard, 1972), p.492.

⑤ Claude Roy, *S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79), p.81.

⑥ Ibid., p.80.

现象^①，无疑证明了罗阿的先见之明。

青年罗阿继续通过阅读探寻中国文化，尤其是大量阅读道家典籍。早在16世纪，中国道家思想便由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到了20世纪，大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三十年，西方陷入社会文化危机，不少思想家、文学家接受了道家思想，视之为“克服精神危机的文化甘泉”^②。青年罗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道家思想的。他自述十八岁的时候读了庄子，二十岁读了老子，然后是列子^③。他被庄子“实验的唯物的神秘主义”^④深深吸引。墨西哥著名诗人、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是罗阿的朋友，他也曾将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他非常推崇庄子，曾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他与蒙田的著作一样重要。”^⑤帕斯认为，罗阿吸收了庄子和蒙田的思想，“与庄子一起微笑，与蒙田一起怀疑”^⑥。老子则被视为典型的东方智慧，主要是因为老子“有无相生、福祸相倚”的概念颇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韵味；老子主张“贵柔”、无为、不争，与西方哲学“尚刚劲”、“重竞争”的主张形成强烈的对比；老子《道德经》短短五千字，展现了“一种让人仰望的简约和神秘”^⑦。神秘、经验、简约、辩证，这也是罗阿对老子思想形成的印象。他觉得，“道家实验的、唯物的神秘主义”^⑧更加真

① Rémi Mathieu, *L'éclat de la pivoine. Comment entendre la Chine* (Paris: JCLattès, 2012), p.54.

② 邵志华：《20世纪初道家思想在西方的接受》，《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4月，第50页。

③ Claude Roy, *Nous* (Paris: Gallimard, 1972), p.492.

④ Ibid., p.493.

⑤ 转引自王充闾：《庄子在西方》，《文化学刊》，2013年5月，第186—187页。

⑥ Voir Claude Roy, *Claude Roy un poète*, présenté par Serge Koster, Edition Gallimard Jeunesse, 1980, pour le titre, le choix, la présentation, la préface, Edition Gallimard Jeunesse, 2001,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 pp.5-6.

⑦ 余秋雨：《世界性的老子》，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6月，第70—72页。

⑧ Claude Roy, *Nous* (Paris: Gallimard, 1972), p.493.

实、有益，与他的精神气质更加契合，相比之下，他一出生就浸润其间的西方传统思想显得矫揉造作。列子也是罗阿所喜爱的中国哲学家之一。罗阿在自传中描绘了艺术家生涯的三个阶段，分别为苦苦奋斗的青年、逐渐成熟的中年时代画了肖像，而艺术家步入智慧的老年阶段以后，罗阿认为这时候的艺术家不存在了，不再说话，不再写作，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坐忘”、“无言”、“无为”精神。罗阿在此引用列子《冲虚真经》的一句话作结：“您为何感到惊讶？一个人得到想要的东西，何须多言？同理，智者一旦找到真理，便沉默不语。南郭子的沉默比任何话语更有意义。他不再说也不再想，因为他无所不知。”^①总之，通过阅读老庄、列子等道家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译本，罗阿体会到，“自己出生在苏格拉底、恺撒、摩西以及圣保罗的人道主义传统，竟然一度以为只有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曾经对生存之谜做出回答，真叫人吃惊。百千万中国人没有希腊哲学，没有罗马法律，也没有亚伯拉罕、布莱士·帕斯卡、路易·弗约的上帝，却依然活得很好。”^②

1952年的中国之行开启了罗阿长达四十几年阅读、翻译中国古诗的历程。罗阿先后出版了《中国诗歌宝库》(*Trésor de la poésie chinoise*, 1967)^③、《盗诗者》(*Le Voleur de Poèmes*, 1991)，后者基本是前者的扩充。根据笔者统计，《盗诗者》总共包括译诗287首^④，反映“宁静的田园”与“爱与死”这两种题材的译诗分别有90首和81首，占据绝对优势，其余题材为“人生如梦”、“沉默者的声音”、“日常生活”等等。中国诗人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大自然以及自己内心

① 转引自：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99.

② Claude Roy, *Nous* (Paris: Gallimard, 1972), p.492.

③ 该书于1980年再版。

④ 该诗集全名《盗诗者：盗自中国的250首诗》，罗阿翻译的中国原诗有250首，但是罗阿为多首中国古诗提供了两到三种译文，根据他的创作原则以及翻译方法，诗歌译成便是另一首诗，笔者以他的译诗计算，《盗诗者》一共包含287首（译）诗。

关系的方式让罗阿大受启发，被他视为“令人安心的异者”^①。奥克塔维奥·帕斯为罗阿的诗集作序，说罗阿罹患重症时“触及生存的边界”、“看到生活的真面目”，幸亏他拥有“几位导师的教导，即王维和苏东坡，虽然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他们都离罗阿非常远，但是这不妨碍罗阿将他们引为知己”^②。总之，他把中国诗人看作是人生旅途的同行者，他阅读、翻译中国诗人的诗作，也是为了凝视自己、叩问自己、支持自己、肯定自己^③。回忆起1952年到中国的旅行，罗阿承认，他对中国首先是一见钟情，而后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和分析文本^④。回到法国，罗阿发表《中国之钥》(*Clefs pour la Chine*)，该书大受欢迎，一版再版，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效应。1955年，萨特访问中国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一大段话评论罗阿的《中国之钥》，认为“由于这部作品，小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些偏见一扫而空了”^⑤。1978年，罗阿再次访问中国，次年，他将陆续发表在《新观察家》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论中国》。在书中，罗阿开门见山便说：“中国以前是、现在依然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这也是我同时代很多人的情况。”^⑥自1952年以来，他不止一次表达他对他所“深深欣赏和热爱的中国人民”^⑦的感情。1987年法国记者、作家热罗姆·卡森(Jérôme Garcin)采访罗阿，问罗阿到过那么多地方以后，最想再次看到并发现哪个国家，罗阿马上回答说，如果他是魔术师，那么他最想实现

① Claude Roy, *ZaoWou-Ki*, Paris: Edition Cercle d'Art, 1996 troisième édition augmentée, p.23.

② Claude Roy, *A la lisière du temps/Le voyage d'automne* (Paris: Gallimard, 1990, préface d'Octavio Paz), p.7.

③ 关于罗阿与中国诗歌，详见本人拙作：《论法国诗人罗阿的中国诗歌翻译》，《跨文化对话》第33辑，在此不予赘述。

④ Claude Roy, *S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79), p.14.

⑤ [法]让-保罗·萨特：《法国作家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徐继曾译，《文艺报》，1955年第21期，第47页。

⑥ Claude Roy, *S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79), p.13.

⑦ Claude Roy, *Clefs po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53), 5^e édition, pp.341-342.

一个愿望，那就是“再次回到中国，看到一个幸福、和平的中国”^①。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江伙生在巴黎拜访罗阿，后者亲口对他说：“我爱文学，爱艺术，爱亲人，而且还有一爱——就是爱中国。”^②与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罗阿热爱、关注中国，并非随大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抽象友谊”^③，而是与中国精神气质相似而产生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二、在中国文化中寻找精神出路

罗阿在政治介入方面的经历、经验也促使他坚定地走向中国文化，从中寻找精神出路。罗阿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身处动荡的年代，不得不介入现实，而这种介入又注定要遭遇挫败。正如阿尔贝·加缪（1913—1960）所言：“同所有我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从此我们的历史一直是杀人的、不公正的，或者充满暴力的。”^④1935年，青年罗阿到巴黎求学，“一战”的硝烟还在空中弥漫，“二战”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大部分法国人依然无动于衷，过着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和同胞的醉生梦死，青年罗阿备感愤怒、孤独，就在这时，查尔斯·莫拉斯^⑤“政治第一”（Politique d'abord）的口号吸引了他。在他看来，为了反抗恭顺、虚伪的现存秩序，捍卫法国的利益，极端的民族主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他与莫拉斯小团体交往，结识了蒂埃里·穆勒^⑥和

① Claude Roy: «Je voudrais arriver à ne pas baisser les bras... », propos recueillis par Jérôme Garcin, *L'événement du jeudi*, 5 au 11 mars 1987.

② 江伙生：《法国历代诗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03页。

③ Claude Roy, *S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79), p.14.

④ [法]加缪：《谜》，[法]古尔蒙等：《海之美法国作家随笔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

⑤ 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右翼政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参加维希傀儡政府，大战后被判无期徒刑，死于医院。

⑥ Thierry Maulnier, 1909—1988，记者、作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罗伯特·布拉席拉赫^①，为后者主编的极右报纸《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撰稿，喊出他的焦虑和愤怒，呼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便抵抗纳粹德国”^②。纳粹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青年罗阿毅然奔赴战场却不幸被俘。战争的经历改变了罗阿的政治立场，他开始与他的朋友罗伯特·布拉席拉赫渐行渐远。1942年，罗阿北上巴黎参加抵抗运动，认识了纪德、季罗杜、艾吕雅、阿拉贡夫妇，并在后者的说服下于194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罗阿结识了在伽利玛出版社工作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并通过后者认识了埃德加·莫兰、莫里斯·梅洛-庞蒂以及乔治·巴塔耶和西蒙·诺拉，他们在一起自由而快乐地谈论哲学、文学、政治^③。1944年巴黎解放期间，罗阿加入法国本土抵抗组织整编的“国内军”(FFI)，和他的朋友罗歇·瓦杨^④一起被委任为战地记者，跟随法美联军穿越德国境内。解放后，罗阿荣获战争勋章。

“二战”以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告终，世界随即进入冷战时期，开始了美苏对抗的时代。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法国共产党内部氛围变得严峻、枯燥、令人窒息，罗阿失去了根据自己的想法从事写作的自由。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法国共产党员大为震惊，有一批人选择离开，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官方揭露了斯大林的虚伪，让大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感到苏联模式的幻灭，更是因为当时的法共不肯正视现实，一味盲目拥护苏联。1956年，罗阿与萨特、罗歇·瓦杨共同签署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宣言，并不顾萨特的反对，与法共决裂。1958年匈牙利事件导致大批知识分子与法国共产党决裂，或者

① Robert Brasillach, 1909—1945,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声名煊赫的作家、批评家，曾撰文为纳粹德国、反犹主义摇旗呐喊，后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枪决，是“二战”后因文获罪的最有名的法国文人，瓦莱里、克洛岱尔、加缪等著名作家惋惜他的才华，曾联名写信向戴高乐求情。

②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210.

③ [法]蕾蒂西娅·塞纳克:《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黄荭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④ Roger Vailland, 1907—1965, 1957年龚古尔奖获得者。

被驱逐出党，两千多个法国知识分子中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名还留在党内。离开法共以后，罗阿万念俱灰，陷入悲观与绝望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青壮年时期的政治介入，挖掘自己痛苦的根源，思考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更好地介入现实。这便是他的自传三部曲《我》(*Moi je*, 1969)、《我们》(*Nous*, 1972)、《总结》(*Somme toute*, 1976)的由来。罗阿深刻揭示自己参加政治运动的原因：“我之所以找到政治，是因为我丢失了上帝。需要宗教，需要信仰，需要教会。需要一种宗教将生存的所有无动机的动机联系起来。需要一种信仰，支撑人类生活的信仰，使之不至于陷入遗忘，沦为慢慢蛀蚀乃至腐烂的野兽；需要一个教会，给人温暖。”^①罗阿曾经从共产主义信仰中得到精神支撑，从法国共产党中找到大家庭的温暖，反之，脱离法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保持距离对他是一大伤害。与法共决裂以后，罗阿失去了精神支撑，他心灰意冷，好像遭到爱人的背叛一般，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了”^②。1981年，罗阿根据自己失去宗教信仰后从莫拉斯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经历，分析了人类在失去宗教信仰以后崇拜、相信某个人或某种意识形态以获得精神支柱的心理倾向，撰写了《寻找诸神的人们：信仰与政治》^③。

1956年，罗阿与法国共产党之间有了裂痕，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是中国文化给了他精神慰藉与精神支撑。他曾经致信华裔著名画家赵无极说：“三个月以来，我一直和你的油画、版画的图片生活在一起，它们让我越来越感到幸福……”^④罗阿与赵无极两人之所以结下深情厚谊，不仅出于艺术家的共鸣，还因为罗阿在赵无极身上“找到中国”^⑤。赵无极的画作帮助罗阿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光，并且最终

①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202.

② Ibid., p.198.

③ Claude Roy, *Les chercheurs de dieux: croyance et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1).

④ Zao Wou-Ki, «Claude mon ami»,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545, juin 1998, p.38.

⑤ 何平编辑：《赵无极的异国岁月与故乡情怀》，《羊城晚报》，金羊网2013年4月13日，http://news.ycwb.com/2013-04/13/content_4412537_3.htm 查阅日期2018年3月16日。

教会他“与世界建立（……）和谐关系”^①。此外，罗阿通过阅读、翻译中国诗歌学习中国诗人面对人生困境的态度，其中苏东坡是罗阿最喜欢的诗人之一^②。1994年，罗阿借助他在四十几年间所陆续翻译的苏东坡诗词介绍苏东坡的生平，出版《苏东坡——来自公元一千年的朋友》（*L'ami qui venait de l'an mil, Su Dongpo*）^③，收录在让-贝特朗·彭塔利斯^④创建于1989年的丛书“我与他”（*L'un et l'autre*）中，是该丛书十大畅销图书之一，也是法国人了解苏东坡的最佳读本。法国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谈起中国，总要推荐罗阿写的《苏东坡——一千年前的朋友》，认为罗阿与苏东坡相契相合，罗阿在苏东坡那里不仅找到了非常有吸引力的诗词，而且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朋友^⑤。引用让-贝特朗·彭塔利斯的话，我们可以说，通过想象、探究苏东坡的生平，罗阿“构建了自己的本质”^⑥，或者正如罗阿所言：“他就是我。”^⑦罗阿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司汤达笔下的人物法布里斯是他的“人生榜样”^⑧。即使加入法国共产党，罗阿还是被称为“十八世纪的共产党员，是司汤达式的共产党员（……）相信幸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能够互相兼容的”^⑨。然而正如罗歇·格勒尼尔所言，罗阿到了晚年终于明白，他所生活的20世纪“失败多过胜利，而胜利又总是

① Zao Wou-Ki, «Claude mon ami»,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545, juin 1998, p.38.

② Claude Roy, *L'ami qui venait de l'an mil, Su Dongpo* (Paris: Gallimard, 1994), p.141.

③ 该书已有中译本，参见〔法〕克洛德·罗阿：《灵犀——一位法国诗人与苏东坡的心灵交会》，宁虹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④ J.-B.Pontalis, 1924—2013, 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作家。

⑤ 转引自 Jun-Pei Liao, *L'univers chino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1895 à 1995*, thèse pour obtenir le grade de docteur de l'université Paris XIII, discipline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2002, p.369.

⑥ J.-B.Pontalis, *Collection l'un et l'autre*. [http://www.gallimard.fr/Divers/Plus-sur-la-collection/L-Un-et-l-autre/\(sourceno\)/116293](http://www.gallimard.fr/Divers/Plus-sur-la-collection/L-Un-et-l-autre/(sourceno)/116293), 查阅日期2018年3月16日。

⑦ Claude Roy, *L'ami qui venait de l'an mil, Su Dongpo* (Paris: Gallimard, 1994), p.8.

⑧ Pascale Frey, “Claude Roy”, *L'express*, le février, 1995, http://www.lexpress.fr/culture/livre/claude-roy_798241.html 查阅日期2018年3月16日。

⑨ Jean-Pierre Arthur Bernard, *Paris rouge, 1944-1964, l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dans la capitale* (Paris: Editions Champ Vallon, 1993), p.198.

遭到背叛、窃取、变形（……）他一开始是要塑造新的法布里斯·戴尔·东戈，最后却只能在一千年前的朋友苏东坡那里找到慰藉”^①。1951年，青年罗阿出版《司汤达》^②，1994年，晚年罗阿出版《苏东坡——来自公元一千年的朋友》，这一切似乎是对格勒尼尔以上说法的一个注解，间接反映了罗阿从司汤达走向苏东坡的心路历程。

罗阿的自传三部曲在他的作品中占据很大的分量，不仅回顾了他的政治介入与思想历程，也回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与思想历程，记录了他们为寻找个人、民族乃至人类的出路所做的种种努力。罗阿见证、亲历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挣扎与痛苦，从纪德、莫里亚克到阿拉贡、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成员，从萨特、马尔罗再到罗阿这一代人，无论有没有直接参加过“一战”或者“二战”，“他们都曾在共产主义、社会-纳粹主义、莫拉斯主义、阿兰种族主义之间奔忙，好像被狼蛛叮咬了一般，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事实上，他们确被咬了，人类面临饥饿、恐惧和战争的威胁，每个人都在寻找，狂热地寻找一种出路”^③。谈及自己在政治立场、政治介入方面的转变，罗阿用一句话总结如下：“40年代我与极右国家社会主义彻底保持距离。56年与极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机器保持相对的距离。”^④在回顾这种转变的时候，罗阿发现自己“不过是广泛统计学中的一个个案”^⑤。的确，1943年加入法共以后，他惊奇地发现，他在《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的很多同事也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选择共产主义，无论出于机会主义，还是出于随大流或者赶时髦，总之是“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方向”，是资产阶级“克服历史噩梦的法宝”^⑥。在

① Roger Grenier, “Images de Claude Roy”,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o. 545, juin 1998, pp.7-8.

② 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见克洛德·鲁瓦：《司汤达》，刘成富、周春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p.213-214.

④ *Ibid.*, p.131.

⑤ *Ibid.*, p.131.

⑥ Jean-Pierre Arthur Bernard, *Paris rouge, 1944-1964, l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dans la capitale* (Paris: Editions Champ Vallon, 1993), p.169.

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探寻中，追求个人与人类的幸福始终是主旋律。1948年，有作家在《法兰西行动报》撰文，宣称追求幸福的人不配当共产党员。罗阿和罗歇·瓦杨随即提出抗议，联名撰写一封公开信，宣称“政治是社会中人获得幸福的一种技巧。马克思主义是有关历史上可能的幸福的科学”^①，这样的宣言直到今天依然掷地有声。在1969年，他的朋友瓦杨又做了自我剖析，宣称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正是为了追求幸福才变成共产党员的^②。

脱离迂腐、僵化的法国共产党之后，罗阿不改初衷，依然认为人的幸福是一切写作与行动的目标，而中国文化“帮助他更坚定他自己的世界观”^③，在遭遇精神危机之后迅速“找到自己的道路”^④，在充满挫败的政治介入之后，依然可以从容、淡定地谈论、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即“人类的生活”^⑤。罗阿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吸收中华文明所提供的生存方式、人生智慧，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一种人道主义的、永远保持好奇心的法国文化传统”^⑥的代表，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法国的克洛德”^⑦（Claude de France）。法国著名记者、批评家、电影史家皮埃尔·毕亚尔（Pierre Billard，1922—2016）曾说：“克洛德·罗阿是我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只要他在，我就觉得自己更能拨开这个时代的迷雾（……）多年以来，克洛德·罗阿留给我们的文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证明并加强了生存的可能性。”^⑧正像罗阿所强调的，遭遇中国是

① Claude Roy et Roger Vailland, “La recherche du bonheur est le moteur des révolutions”, article dans *Action*, juin 1948, repris dans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294, décembre 1991, pp.32-35.

② Roger Vailland, *Écrits intimes* (Paris: Gallimard, 1969), pp.500-501.

③ Hector Bianciotti, “Claude Roy le poète”,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545, juin 1998, p.18.

④ Jean-Michel Quilbier, “Claude Roy: la poésie est un dépasse-temps”, *Quoi lire magazine*, N° 3, pp.15-16.

⑤ 转引自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a vie politique de Claude Roy”,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545, juin 1998, p.36.

⑥ Catherine Réault-Crosnier, “Claude Roy: poète et humaniste (1915-1997)”, *Verticales*, n° 12, février 1999, p.8.

⑦ Jean Daniel, “Nos mardis à 17h30”,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545, juin 1998, p.27.

⑧ Pierre Billard, “Claude Roy: le compagnon nécessaire”, *Le Point*, N° 814, 25 avril 1988, p.153.

他及同时代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借用罗阿对自己传记的评价来说，他与中国的关系，是一部“个人史，但是具有普遍意义”^①。研究罗阿与中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位法国著名作家、诗人，也丰富了我们对20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认识。



① Claude Roy, *Moi je* (Paris: Gallimard, 1969), p.132.